

第十三章 中国的改革与天安门事件

不善于临机应变的中国大陆

正当台湾处于巨大变革潮流之中的时候，中国大陆围绕着“改革、开放”路线的实行，在主张稳步前进的“原则坚持派”与要求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思想方面也要进行改革的“改革推进派”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其结果是被视为会成为实权者邓小平后任者的改革推进派旗手胡耀邦，由于同情“资产阶级自由化”，在1987年1月16日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

“改革开放”的波纹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时代是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以此为大转机，中国大陆告别了以政治思想领先的文革时代，开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时代。

但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进，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带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由于实行了开放政策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电视或进口商品接触到了外国的东西，开始知道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及“自由”和“民主”与自己一直想像的不一样。另外，随着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但黑市买卖、投机倒把，以及利用权力和不义之财来搞不正行为，贪污腐败等也开始蔓延。

“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从内部冲击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③坚持党的领导；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还出现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危机”。

人们发出呼声要求政治能发挥缩小贫富之差和等级分化、监督依仗权势的贪污和腐败现象的机能。还有人提出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也很有必要。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及从海外留学回国人员写出了抨击权力腐败的作品和要求“民主”、“人权”的评论，不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人当中有王若望（评论家）、方励之（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刘宾雁（作家）、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和白桦（作家）等人。

实事求是与四项原则

胡耀邦总书记注意倾听了这些意见。他本人也主张，“改革开放”不应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应该反映到政治思想方面。这与在扭转文革路线时，他所提倡的并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是一致的。

当时由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上方宝剑而得以成为其后任者的华国锋极力坚持毛主席的决定和指示是金科玉律，搞“凡是派”。这就使得由于毛主席的指示而撤消了党内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及许多领导人无法再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打开这条通路的就是运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准则。这也是与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本人曾多次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是一致的。

但对“改革开放”路线持慎重态度的以一些革命元老为主的“原则坚持派”强烈批判胡耀邦的态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保守派意识的邓力群、胡乔木、王忍之等主张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胡总书记持对峙立场。

占优势的“原则派”

在争论日益激烈之中，86年夏天开始了将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的起草准备工作。决议的起草以胡总书记为主进行，9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当初胡耀邦的草案里写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坚决实行政治改革，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写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据说对此批判很激烈，还加进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与人民的利益和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这一段，胡总书记也让步了。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从86年9月27日开始在北京召开了，陆定一主张削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引起激烈的争论。会上，邓小平作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据说，胡总书记希望这次会议的争论问题还要向下传达，但保守派元老之一王震在中央党校却发表了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内容。结果，邓小平被说成是否定政治改革，引起了各地的学生运动。

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赵紫阳总理受党中央的委托在9月13日曾向邓小平提交了报告。

赵紫阳主张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了国家永久的安定一定要加速政治体制的改革”，并提出，由他本人、加上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委员会。邓对此表示同意，委员会不久就成立了。

政治体制改革本来应该是党总书记分管的工作，但身为总理的赵紫阳却被委任去负责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工作，这里面是有含义的。在86年9月的时候，实权者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不满。邓氏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他一定是考虑到，政治改革是要一定的经济建设作基础的，胡乱地搞什么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革，只能引起和扩大混乱。

胡耀邦无奈的让位

86年12月4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本省的选举制度。这很快就波及到了武汉、上海、深圳等地，并逐渐影响到全国各地。87年1月1日，未经许可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了集会。但由于当局重视事态的发展而进行了严厉地制止，示威游行也慢慢停止了。

学生的要求是，改革选举制度、反对新的学制、改善生活待遇等，这都是些很自然的要求，但这同时也是受到了自春天以来所进行的有关政治改革争论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研修回国后在各地的大学进行了讲演。他强调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提出民主不是靠恩赐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由于这种局势，自秋天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更加产生了种种危机意识。

胡总书记希望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慎重对待这种局面。但最高实权者的邓小平对胡氏的态度极其不满，指出对形成学生示威游行背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用“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抵制。86年12月30日在与包括胡总书记在内的党的首脑层的讲话中，邓要求开除方励之、王若望等人的党籍，并强烈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领导者要做到旗帜鲜明。

87年1月16日召开由革命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七名代表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胡耀邦总书记本人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并由赵紫阳总理兼任代理总书记。在此会议前后，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也被开除了党籍。其理由是他们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服听从组织原则。

背后有来自革命元老的压力

1月17日党中央三号文件“薄一波对胡耀邦辞职背景的说明”在党内进行了传达。文件列举了“六条错误”，其中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不遵守纪律随便乱发言”、“鼓吹经济‘高消费’”、“不该在外宾面前说的话也说”等等。

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围绕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争论，以及对学生运动的处理方法，但其背景可以说有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胡耀邦对腐败、官僚政客的揭发检举认真对待，并坚决依法惩处。有些革命元老的子弟，即“太子党”们也成了揭发检举的对象，结果，就招来了共产党的元老们的一致反对。

第二，胡耀邦严格地执行了邓小平所提出的革命元老的引退和年青化，并且还赞成邓小平本人的完全引退。对这一点，党的元老们对邓小平的过早引退是异口同声地反对的。

第三，与一同站在“改革派”立场上的赵紫阳总理以及周围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胡耀邦实行以“实事求是”为准则来深入进行思想领域方面的改革，而赵紫阳却是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以此来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以上三个因素中，第一个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为此，胡耀邦去世时，人们对他的廉洁奉公、坚决打击腐败现象的严格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正是这一点，没有同一直重视与革命元老之间保持一致的邓小平步调一致，以致于胡耀邦不得不完全交出政权，而且对胡的评价也很苛刻。在这一点上，赵紫阳没有采取与革命元老们进行正面冲突的态度。这即是“改革与开放”过程中的一种处世方法，也符合了邓小平

的选择。

友人对胡耀邦的评价

笔者没有会见过胡耀邦，但作家及新闻记者刘宾雁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几次曾在胡耀邦手下工作过。他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

下面是摘自《刘宾雁自传》中的一段。

“胡耀邦正义感极强，嫉恶如仇。他尊重文化，非常爱好学习和思考，接受外国的新思潮，倾听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声。他对人真挚，不搞阴谋诡计。是一位坚定、最勇敢的改革派。像胡氏这样水平的极少，他的品质在中国政界也就成了弱点了。”

刘宾雁还写道。

“胡不善于区别不同的人，他重用的人能真正与他肝胆相照，并在中国改革大业中同辱共荣的极少。他有时下决断太轻率，有时急于求成，另外当机立断不够。”

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胡耀邦思考的基点是在“实事求是”上。在文革后的大转换时期，正是这种基点为实权者邓小平打开了恢复政治生命的大门。胡氏在“改革与开放”开始后，也大胆地运用了这个基点。为此，以革命元老为中心的“原则坚持派”批判其是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方也有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体质中封建官僚主义还根深蒂固地存在。

因此，在拥有五千年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与辽阔土地的中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不是说变就能变，得花时间和工夫，而且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在这个国家掌舵的人，一定得是一位具有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指挥的才能和胆识的人才行。

从这一点来看，胡耀邦足以当了一位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代言人，但他没能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共产党元老保守派当中及军队内部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结果，在实际的政治改革中所进行的“世代交接班”问题上，最终遭到了革命元老们的反对。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尽管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都被撤消了，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路线除了形式有些变化，却一直在照样进行。胡氏退任后任“代理总书记”、后在 87 年 10 月下旬召开的第十三届党大会上被选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前任总理），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赵紫阳的巧妙战术

赵氏在政治上足智多谋，但在决定重大政策时，他大都要在事前征得实权者邓小平的同意。这是防止包括革命元老在内的那些保守的“原则派”反对的一种巧妙的战法。

不幸的是，赵紫阳由于“天安门事件”（89年6月4日），也遭到了被撤消总书记职务的命运。但是，他在短短的就任期间里，提出了把现在的中国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为把“市场经济”引进中国建立了理论上的根据。同时，他还推出了“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打开了参入亚洲雁行经济发展“大圈”的道路。

1987年的前半年，由于胡耀邦总书记的辞职，以及开除了强烈要求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改革的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党籍的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曾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赵紫阳在代理总书记时，早在1月29日的春节讲话中就针对运动的内容提出了：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思想政治方面进行，不延伸到经济领域；②“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同是重要的“两个基本点”，哪一点都不能忽视。

对此，邓力群等保守派势力反对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划上范围，并反驳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的根源就在经济领域里。”而且，他们还不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好像是鱼网的网，而“改革开放”则是鱼网的网眼的“纲举目张”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要举起了纲（即基本原则），目（即政策）就会自然张开。

对此赵紫阳征求了实权者邓小平的意见。邓氏批判了“纲举目张”的理论，并认为1986年以后的风波（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和胡耀邦倒台）不应该影响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路线。

赵紫阳代理书记领会了邓的意思后，在5月13日召开了党中央宣传部门干部会议。他强调了邓小平指示的精神，对保守派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提出了反驳，阻止继续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把在胡耀邦总书记时代时，“实事求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冲突以至于出现恶性循环的那种状况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被任命为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得在马上召开的第13届党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而负责党大会“政治报告”编写工作的一直是像邓力群、胡乔木等一些“原则派”的理论家们。这权力怎样能移到“改革派”手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给中国现状定位

赵氏在87年3月下旬就准备在第十三届党大会上提出的基本方针去征求过邓小平的“批准”。他大胆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构想，并向邓请示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准备在5月初写出大纲，到7月为止完稿，然后在北戴河的党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审议。”四天后，邓发出了同意的“上方宝剑”。

于是，赵紫阳组成了有十九名改革派参加的智囊团，开始了给中国现状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起草工作。他认为如果把这个提出来的话，可以对几个重要问题作出根本的回答。

第一，对中国实际上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识。第二，纠正文革路线的 78 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革路线从即以后，选择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在赵紫阳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想从这个阶段跨越过去的人可以被认为是“左”倾，相反，无视社会主义的人就可以被区别为“右”倾。

中国曾说过“文革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与那时相比的话，赵的理论就成了一种大大后退了的理论。但在中国存在着不得不正视的现状，这是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封建社会灭亡后资本主义社会随之到来，等到资本主义开花、成熟、腐败以后，再是社会主义的到来。

但现实是，包括中苏两国在内，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又建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一个还没有。因此，赵紫阳强烈地感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努力吸取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的成果，就无法跟上世界的局势。

第十三届党大会的意义

第十三届党大会于 87 年 10 月 25 日开幕，于 11 月 1 日闭幕。这次大会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①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党的基本路线，即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

②通过了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根据。

③为了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彻底进行，决定了以党政分离、权利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④第一代革命元老们退居二线，中央领导班子明显地年轻化。

在这次大会以上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的现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这一点全世界特别关注，“中国真要变了”，大家表示了广泛的好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主要精神是：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步；第二，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建国（1949 年）开始算起，最少也得持续一百年，到 2050 年以后才有可能到达现代化社会主义阶段。

这个论断，与一直坚持的快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

这个新的认识马上就在下面三点上在政策上反映了出来。

第一，在以有国制和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存在。而且，私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得以保护。

第二，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一直被批判为“剥削形式的收入”而遭到禁止的利息、股票、经营者的风险报酬、个体企业者的经营收入等都得到公认。

第三，受初级阶段这个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逐步进步改革也得以正当化。88 年曾一时引起热烈讨论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革命元老们的退居二线与邓小平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革命元老们全部都从一线上退了下来，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班子的年青化。但是，如果把在此大会闭幕的下一个月即 11 月 2 日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所产生的新的主要班子一起来看的话，就可以清楚看到，一方面年轻化和改革派的进出很突出，但另一方面元老们的威信和影响力还仍然很大。

党大会的最高领导班子的人事，像邓小平、陈去、李先念、彭真等革命元老们是否会完全退下来，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其结果是，邓小平以下的第一代革命元老们不但从中央政治局退了出来，而且还不当中央委员，成了一名普通的党员，使得最高领导班子实现了年轻化。但是，在第二天即 2 日的一中全会上，修改了党章，并增设了新的机构，邓小平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原则派的”革命元老之一的陈云则任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陈两个人没有完全退下来，被称为“半退”。对此，11 月 5 日报道说，邓小平曾说了“想在头脑还清楚时退下去”，并透露了邓要在不久的将来从所有的职位上退下去，对没有马上退下去作了解释。

据说，这种安排是根据新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的提案，而进行的“秘密决议”，即，邓小平即使不当中央委员了，也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终决定人物，今后在重大问题上都要倾听邓小平的意见。

在 13 届党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保守派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书记处委员邓力群落选了，被放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就由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 5 人组成，赵紫阳和胡启立两名“改革派”也就掌握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由于赵紫阳总理由代理总书记正式被任命为总书记，11 月 4 日李鹏副总理被任命为代理总理，88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正式任命为总理。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后，作为改革开放新的尝试，提出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他在 13 届党大会后，曾 3 次对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进行了视察，他看到了在这些地区近郊农村的工厂及乡镇企业实行的承包制和效率化进行得很顺利，其结果都超出了他预料以外。

88 年 1 月下旬，赵紫阳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战备，并指出：“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非常好。特别是，外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引进外资、依靠出口获得外币也进展良好。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今后一段时间里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会更加上一层楼。

在他的脑子里，早已有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王健副研究员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提供了基础。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构想：让中国的沿海地区也参与到所谓的雁行型经济发展去。雁行型经济发展（即重层的追迹关系）是指 NIES（即亚洲四条龙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在追赶由于扩大了与美国的贸易而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而四条龙的后面又有亚太组织各国在追赶。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是在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上决定开始实行的。具体内容是要在沿海地区发展面向海外的劳动集约型产业。其主要任务由乡镇企业担任，沿海地区的加工业要坚持“两头在外”，大量进口，大量出口。这样使得沿海地区经济转为外向型。所谓的“两头在外”，是指原材料的调配和产品的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根据这个战略精神，决定了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政策。

价格改革失败而导致的考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及接下来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大陆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改革、开放气氛之中，投资和消费都出现了过热现象。88年的投资本来预定要减少9.8%，却增加了20.2%，工资总额增加了23.8%，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27.8%。同时，零售物价的上升率创记录，达到18.5%，货币流通量也增加了46.7%，使得通货膨胀更加厉害。为此，中国各地出现了流通及出口部门用高价竞相抢购粮食、棉花、茧丝的“大战”现象。一些不法投机分子、官僚掮客乘机活动，群众对这些腐败现象目不忍睹。

在这种情况下，88年5月实权者邓小平正式提出了要进行价格改革。赵紫阳总书记的智囊团进言给赵，应该首先解决通货膨胀后搞价格改革，但赵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是把价格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同年8月，价格改革刚一发表，各地就出现了包买的混乱现象，经济调整已迫在眉睫。但经济调整的主导权是由李鹏、姚依林等保守派掌握的，赵紫阳总书记由此也失去了智囊团对自己的信赖。

不适时机的价格改革所带来的失败，使得曾为“改革开放”提出了非凡发展战略的赵紫的前途，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巨大的冲击——天安门事件

1988年的经济过热以及在此期间断然实行的价格改革，使得通货膨胀更加恶化。物价的突飞猛长引起了城市居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给此火上加油的是，还有“官倒”的恣意妄为，干部利用特权的腐败现象等。知识分子和机关工作人员，由于经济改革，他们的收入一时跟不上去而非常苦恼，另外，政治改革也没有什么具体进展——对“法治”的失望感越来越大。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日益高涨

在这种局势下，出现了以民主化运动来打开这种局面的现象。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了“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2月13日，北岛、陈军等33名知识分子发表了“公开信”，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以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进行大赦，释放政治犯。3月8日许良英等四十二人，24日戴晴女士等人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公开信”。

要求民主化的运动以4月15日胡耀邦前总书记逝世为契机，急速地高涨起来。北京各大学召开了胡

耀邦的追悼会。要求给予回复名誉，后来又出现了批判党和政府的大字报、宣传口号、花圈等，16日开始出现了示威游行。18日，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请愿游行后，要求与李鹏总理对话，并试图冲进新华门。20日北京大学成立了“高校联合筹备委员会”，宣布废除以前的学生会。21日各大学相继成立了新的组织，23日成立了“高校执委会”。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学生们聚在天安门广场收听了实况报道。听完后学生代表提交了请愿书，要求会见李鹏总理，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抗议政府的呼声更高，很多大学的学生开始罢课。对此现象，实权者邓小平在25日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断定“这不是一般的学生运动，而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第二天即26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动乱”还是“对话”？

4月27日学生组织交换了战术。打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原来的“打倒独裁政府”也换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三万人左右的队伍从大学区出发向天安门广场走去，继续要求“对话”。这支请愿游行队伍成功地突破了公安当局设的封锁线。这天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会见了由北京16所大学组成的学生组织“北京市高校自治会联合会”（即高自联）的代表。但《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所坚持的立场并没有让步。为此，“高自联”在5月2日又以四十多名大学生的名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了要求对话的请愿书，并要求3日中午以前给予答复，但3日上午何东昌副主任及其他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拒绝”对话的答复。

在第二天即4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度总会上，赵紫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对学生行动表示了理解。学生方面对进行对话的期待感由此高涨，而且出现了停止罢课重回课堂的迹象。学生们选出了对话代表团，在6日又向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党中央提交了请愿书。但由于迟迟不予以答复，学生们准备进行绝食示威，13日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示威活动。

为了历史性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书记将于15日访问中国。当局很重视事态的发展，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等人从14日开始与学生进行了对话并要求停止绝食示威活动，但没能说服学生方面，绝食者中已开始出现有人昏迷。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访中，新闻媒体从世界各地涌向北京，在他们的注视之下，广大群众也参加了进来，举行了支持学生们行动的示威游行。17、18日两天出现了号称“百万人示威游行”，中国国内的局势已发展到了非同小可的程度。

赵紫阳在党的领导班子中孤立

就在天安门广场被学生的大队伍“占领”的同时，16日上午举行了中苏两党首脑会谈，为长年以来两

党的对立面上了句号。会见戈尔巴乔夫书记长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日下午，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他指出，在上午的会谈中，中苏已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时说到，“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有必要请邓小平同志掌舵。”虽然，这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但把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公开出来还是第一次。

赵的这个讲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引起了极富敏感的反应。党、政、军的干部们领会其含义是，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希望对学生的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采取柔软路线，但没得到邓小平的许可。当天晚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学生运动的对策。

赵紫阳总书记在会上提议对学生实行让步对策。并指出要承认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立场是错误的，就那篇社论，尽管自己正去北朝鲜访问了，但允许其见了报，自己也责任。

但是赵的提议遭到了常务委员会多数的反对。就学生运动的对策，党中央领导层内出现了分歧。

在17日以后游行队伍中，党的直属机关及国务院也有不少干部举着所属单位的旗帜加入了进来。这天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赵紫阳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还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实权者邓小平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并决定北京一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戒严令。

19日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总理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宣布实行戒严令，赵紫阳总书记拒绝出席那次大会，没有参加。

学生运动的颓势和急躁

5月20日上午10点开始实行戒严令。示威游行人们为了阻止戒严令执行部队的前进，用二百二十辆公共汽车组成路障，封锁了主要的道路。绝食已经停止，原来的“高自联”也由“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代替了（后又称“广场保卫指挥部”）。

23日成立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后来由“外地高校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等组成了“首都各界联席会”。改革派优秀人才占多数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公司、北京青年经济研究会等单位的领导人也积极参与了支援活动。

在这种局势下，在实行戒严令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声势确实还很大。23日还举行了要求李鹏总理下台的“百万人示威游行”。但是28日在北京举行的迎合“全世界华人示威游行”的游行只有两万人参加，由于上面的压力而有一种危机感，运动开始出现了孤立化。学生运动的指挥组织不断更换，没有形成一个持久的指挥中心，运动的主导权不是北京，而是由地方上京一些人的感情上的急进主义所驱使。

30日，高达5米的“民主女神”像竖在了天安门广场，6月2日候德建（台湾的一名歌词作者）、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师）、周舵（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高新（《师大周报》前总编辑）4人开始绝食。但是，运动已明显开始出现颓势。

军队开枪出现流血的惨景

这期间，曾有人提出要求召开人大紧急会议来作为撤除戒严令的有力手段，这引起人们的关注。到5月24日有三十八名常务委员签了名，后增加到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已超过了包括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在内的一百五十五名成员的三分之一，使得戒严令的实行出现危机。

当时，身为委员长的万里不在北京，他在访问地加拿大讲到对民主化表示理解。但25日他知道了人大内部的紧急情况，到了上海后，不知为什么没有飞北京，而是留在了上海。万里是一位改革派的重镇，又极其亲近邓小平，他的决定很令人关注，但他在27日还是发表了支持戒严令的书面讲话。这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签名运动也宣告失败。

戒严部队确认，从6月3日拂晓起首都发生了重大反革命暴乱，于是在下午两点半向首都周围待命的各方面部队发出了“紧急出动命令”。各部队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发生冲突最厉害的西线（即西长安街方向）有人开枪，以至于出现了流血的惨事。

戒严部队从4日凌晨一点半左右开始到达天安门广场，原计划在凌晨4点半前控制并清理好广场，结果用了约三十分钟就完成了任务。最后留在广场上的几千名学生，由侯德建、周舵等人与军队方面交涉后，都安全地离开了广场。

由于戈尔巴乔夫访华结束后还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媒体留在了北京，他们的“采访报道竞争”使得当时来自北京的报道急速地白热化，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有的通讯社甚至报道说死者超过五千人，使世界都为之震撼。尤其是，解放军对一般老百姓开枪的那些逼真的镜头以现场转播的形式送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这种冲击之大，在人们脑海时留下了无法抹掉的印象。

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是在过了很久以后才大白的。李鹏总理对在同年9月访问中国的访华团团长伊东正义提到，镇压“暴乱”时的死者人数为三百一十九个。

邓小平对事件的分析和指示

天安门事件的镇压后，马上开始了对“暴乱策划分子”的追究责任。6月11日对方励之夫妻（他们俩在5月已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要求了保护）、13日对二十一名学生领导人、25日对七名知识界人士在全国先后发出了通缉令。同时对新闻报道有关部门、社会科学院、一些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处分。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局局长的更换（6月）、香港《文汇报》社社长的免职（7月），北京大学校长及文化部部长王蒙的更换（8月），等等。

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解放军的领导干部，对他们在镇压中所付出的辛苦进行慰劳。同时，就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教训，以及今后的基本方针，作了以下的指示。

“这次的动乱，迟早是要发生的。这是国际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交织而至。我们有了经验丰富的革命老干部使得我们能对付乱子。”

“这次事件的发生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战略目标是错的。四项基本原则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没有一

直坚持，在教育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做得极其不够。”

“今后怎么办？我们要连续坚持所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个别的地方说法也许不些改变，但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会变。”

6月23日和24日两天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了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赵紫阳由于“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撤消了总书记以及党内的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

“就是万一塌下来，也有胡耀邦和赵紫阳顶着，我们放心。”

这是实权者邓小平在1984年3月与日本的中曾根首相（当时）会谈时说的话。但富有讽刺意思的是，把两位都培养成了总书记的实权者，又自己亲手把他们俩给免职了。

尽管如此，邓还是一位在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久经百战的经验，站在巨大中国顶点的超人，他如同一只不死鸟，政治上曾三起三落。在这漫长的转换时期中，他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他将会把中国引向何方？人们都刮目以待。

在美国听到的对祖国的思念

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给全世界极大的冲击。对笔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晴天霹雳。本希望的“斗智而不斗力”彻底地成了泡影，只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怒，精神也几乎要崩溃。中国就这样从此没有“希望之光”了吗？不，一定不会，我心里这么想。

香港极强的恢复力

在当时的情况下，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连接中国大陆和外边自由主义世界的重要据点——香港的反应。也许是善有善报吧。“天安门事件”的十天后，一位屈指可数的香港要人来到了日本。这就是我从当特派员时候起就很熟悉的香港政厅的廖本怀地方行政长官。

第二天即6月15日，我马上就去拜见了。他一开口就说道，“尽管最近的局势是这样，但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会变坏。”他接着说。

“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令人感至震惊，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天安门事件的第二天即5日，股票价格下跌了25%，充分表明了冲击之大。但这几天股票价格指标的恒生指数正在慢慢地回升，另外对港币的对换率也没感到任何压力。”

“特别要强调的是，现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相互是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外币收入的25%到40%是由香港提供的，中国对外贸易大约有70%是直接和香港或经由香港而进行的。同时，香港许多加工业也靠在中国搞转包加工，仅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百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受雇于香港企业。”

“香港在过去曾经历过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中英谈判期间对香港前途不安等困难时期。每次，

它都显示出了极其强的应变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一点望仔细观察，并希望日本美国对香港能有更多的投资和经济合作。”

“现在，西方先进诸国似乎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向中国施加压力。就基本人权问题对中国制裁也许有其道理吧。但这种外来压力有多大效果，那就不得而知了。就我来说，是希望中国能冷静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尽早恢复到原样。”

对我这个曾两次在香港学习并采访过的人来说，廖先生的一席话使人感到不乏其说服力。

二十二年后重访美国

但我并没有计划要去中国大陆。由于“天安门事件”而被当局驱逐出境逃到欧美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接受这些人的当地的中国侨民，他们是怎么看北京的那场流血事件的？他们对“祖国”的前途寄与怎样的期望？这些倒是我非常想知道的。

这时候即7月初从洛杉矶寄来了一封邀请信。这封信是以《中国了望》（“China Watcher”）而著称，并在美国拥有采访据点的香港半月刊杂志《百姓》的陆铿社长寄来的，（此杂志现已停刊）。邀请信说7月22日将是陆社长的七十大寿之日，届时准备在洛杉矶南部的一所具有现代化风格的大寺院“西来寺”里举行庆贺大会，希望我能去参加。

当时，我在东京总社的国外通讯部是负责中国及亚洲问题的编委成员之一，同时，还担任朝日新闻面向美国的卫星版的编辑工作。我跟同事们说了陆社长的邀请信之事，他们都劝我说，“一定得去。我们非常想知道我们卫星版的对象以及读者的反应，逃到美国去的那些中国人的情况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一直以中国为主在亚洲各地采访，这次去美国是自1967年夏天第一次访美以后，相隔了二十二年的第二次。

著名教授批判武力镇压行为

7月21日，陆铿社长亲自到洛杉矶国际机场来接我。第二天在西来寺的大会堂里举行了诞辰纪念庆贺会，来自各地的友人有五百多人参加。令我吃惊的是，中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当时任民主同盟副主席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的千家驹教授（当时八十多岁）也在场。另外，由于积极参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而受到停刊处分的北京的一家杂志《新观察》的总编辑弋阳也是来客之一。

千家驹说“我是以学术交流，探亲访友的目的来美的。这两年一直在香港临近地区深圳经济开发试验区埋头搞有关改革的研究，没有参加这一连的民主化运动。”但他接着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并说“对用武力来镇压学生运动我是反对的。”“希望中国领导人能顺应社会舆论尽快停止对运动参加者的逮捕和追究，解除戒严令，安定民心。”

弋阳女士说她是作为中国文化人士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到美国访问的，在调整回程机票的时候，下了戒严令，回程日期只好等机会了。她说：“共产主义必须理解人道主义才行”，对用武力镇压民主化运动进行

了强烈地批判。

台湾高僧提出要气度宽宏

有一点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著名的教授和知识分子都在西来寺的星云大师的身边聚集一起。这位星云大师是一位在台湾拥有近百万信徒的高僧。国共内战时期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高雄郊外创建了临济宗的佛光山寺。此寺被称为世界佛教界十二个圣迹之一。洛杉矶的西来寺，也花了近十年功夫才告以建成，是西半球屈指可数的大寺院之一。

星云大师本人在那年曾率领了一个“佛教弘法探亲代表团”（一行七十二人）从3月下旬开始在相隔了五十年后中国大陆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在家乡扬州，他的母亲大人还健在。在北京他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先念、国家主席杨尚昆（两人都是当时的职务）进行了亲切的会谈。

对我要求采访的希望，星云大师欣然答应。对回中国后发生在天安门周围的惨事，他多次说到“还有许多没法说”，“希望共产党政权能更宽宏的气度。”对来自其它国家的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呼声，他说道，“应该理解，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是装有对中国的期待和爱护的心意的。”

大师强调说，“中国大陆和台湾应该朝着和解和统一方向努力。”其前提条件“大陆方面应该向国内外宣布把台湾海峡作为‘和平地区’，”另外，大师还提出了以“同等的立场”进行谈判的见解。他反复多次说，希望中国最高领导层能允许并尊重“异己的存在”。

用非暴力行为实现民主化

正值我访美期间，从7月28日开始连续三天在芝加哥的耶利诺依大学召开了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在美国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每所大学推荐两名代表参加大会，另外，还有来自加拿大、香港、台湾、日本、法国、西德、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关心民主化运动的人士参加。

作为特别来宾坐在台上的那些人当中，天安门事件后逃到国外的那几个人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北京各大学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前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前北京市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北京学生对话团负责人沈彤，等。

在一千多人的气氛热烈的会场上，吾尔开希致开幕词。“能参加这样历史性的盛会，感到荣幸”，“这次大会是希望的开端，团结的开端。”被称为是民主化运动理论家的严家其指出，文化大革命与这次民主化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文革中提出的“打倒刘、邓”的口号，使得权力向毛泽东集中，而这次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批判邓小平”现象，则在广大的范围内使得中国人民对民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长期以来由统治中国历史的最高领导人来作“一言堂”的时代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大会对当局向北京那些要求“爱国与民主”的学生、工人、以及一般群众用武力进行镇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在分组会上，就是否要把即将成立的这个新的组织以与中共对立的形式取名为一个政党的

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讨论。

但最终决定这个新的组织为“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并在通过的宪章中指出，此组织是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手段、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人权与法治的“协调性的组织”。对此，三分之二的人投了赞成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半数表示反对，另外半数表示弃权。这样，这个政治色彩淡薄的联合会组织就成立了。

目标是与国内同胞携手

在这次大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之一，加州大学（巴古列分校）的化学博士黄升育说，“这次大会使我们学到了民主、秩序和团结，是一个成功的大会。”另外，他还指出，“有些人提出要结成政党与中共抗衡，而且不惜使用武力手段，这种主张，目标过高，不切实际”，今后在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上要继续进行探讨，“使此组织能成为一个与国内同胞保持一定的联系的海外留学生及学者的组织。”

大会期间还展出了以“天安门事件”为题而设计的近二十种图案的抚恤衫，参加者们一下子就抢购一空。

例似这样的活动在美国拥有最大“唐人街”的纽约市也连续举行。天安门事件后成立的“中国人团结会”的会长陈宪中（一家印刷公司的社长）说，“那次的惨事对不问左派、右派、中立派，即所有的中国人社会给予了对团结的希望。在年长的保守派在世期间，要实现民主化也许是非常困难的，但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尽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努力。”

在华盛顿，我有机会与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时报周刊的社长）进行了会谈。他说，“北京的那次惨事给美国整个社会很大的冲击。”另外，他指出，“由美方主动提出，贝卡国务长官在巴黎会见了钱其琛外交部长。在人权问题的同时，地政学的国际战略也开始隐隐可见了。”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预定今年秋天去中国访问的原美国大总统尼克松和原国务长官基辛格一行将会受到关注，为此北京方面也许有必要研究采取一些缓和措施，比如“解除戒严令”等等。

寄望于华人社会的智慧

到8月5日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奔波采访在盛夏的美国。这个国家自身尽管有各种问题，但它向外国人提供着“自由”这么一个珍贵的舞台，使我对这个国家宽宏有了新的认识。在这儿，我有机会见到了在有限的点线上，述说对“祖国”思念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中国人社会的人们。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来自希望在中国大地上能实现自由和民主化的人们的呼声，尽管他们的党派，地区，性别，年龄等都不同。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希望这种实现是通过非暴力手段，同时他们还强烈要求中国领导人能具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宽宏气度。

在这点上，使我收获较大的是跟像黄博士这样的人的谈话，他在文革期间在中国渡过青年时代，改革开放后又在美国求学搞研究。另外与一起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能和平统一，云游世界的星云大师的拜会，

也使我受益非浅。在这里，使我们窥视到了中国人社会的那种柔韧而坚强的智慧的一面。

还有一个收获是没想到的。在芝加哥郊外，我有幸见到了从二十二岁起一直担任已故毛泽东主席的主治医生（直到毛去世）的李志绥博士（当时 69 岁）。那次采访报道后回到日本，在同年 8 月 14 日《朝日新闻》的晨报上登载过。后来连同以后几次采访报道一起，登载在《月刊 ASAHI》（12 月号）杂志上。

李博士后来写了《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一举成名，但不幸的是，不久就去世了。在这儿，我只能祈祷他安息了。

克服冲击探求共存

“北京表面上已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一边看着那些丧气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边努力地学习。”——1990 年元旦。这是从日本去中国留学、由于天安门事件所受的巨大冲击，而对中国失去了希望的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写给我的贺年片上的一句话。贺年片上还写道，“在生活方面有这儿独特的‘规章’和惯例，有许多是到这儿后才知道的，这使我再次领会到了留学的益处。”

祸中有福

这张贺年片使我产生一种“祸中有福”的感觉。

北京中心地区的戒严令在 1 月 11 日宣布解除了。这是自那次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的七个月以后的事。以此为契机，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先进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朝改善的方向发展。

关系改善的征兆在 89 年秋天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中以及 12 月 9 日布什大总统的特使派遣等节目中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每次迎接美国的来宾时都是最高实权者邓小平、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总理李鹏等全部出来欢迎接待。这不但使由于美苏和解、东欧改革而仅剩下来的美中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而且也是就亚太地区的发展战略进行对话的难得良机。同时为了表示中国国内局势“安定化”，也就解除了成为改善关系最大障碍的戒严令。

但尽管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有了缓和，可民间的关系改善却并非易事。电视里解放军朝一般民众开枪的镜头给许多日本市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们对中国的一腔热情遭到冷水透浇。他们对与中国采取了不同行动的东欧以及苏联的民主改革产生了好感，对“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动向，总有一种抹不掉的后遗症之感。

实际上，日本去中国的游客一时猛跌，一些从事日中关系的旅行社是一愁未展。一些大商社对中国的将来深感不安，提出要缩小对中贸易范围。学汉语的人数也一落千丈，而学俄语和德语的人却开始增多。

注视台湾和香港的动向

我认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一直注视着海外的中国人、华侨和华人社会的动静。因为我总觉得，对中国的动向要有独特的方法才行，那就是不能光靠“脑子”去分析，得靠“身体”亲自去体验感觉才是。台湾人和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动向是怎样对付的？我很想亲眼去看看。

90年3月中旬我去台湾、香港及中国本土一共转了两个星期。

“现在台湾正掀起第二次大陆热哟。”——到达台北的那天晚上，一位在一家大型旅行社工作的旧交对这么说。

“去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确实是冲击很大。但去大陆的游客也就低迷了不到一个月，大家都已确实感到那样的事件不会再容易发生了。去年游客达到一百二十万人次，是前一年的近五倍。”

正式的数字据说是五十四万人次。大陆旅游路线不仅有公认的途经香港的，令人意外的是更多的人是先去菲律宾或新加坡等国再进中国。

前一年西方先进诸国的访华游客大幅度减少。其中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日本，只有三十五万八千三百人次，比前一年减少了四成。与此相比，两年半前还规定“访问禁止”中国的台湾，去中国的游客一举超过了日本。

第一次的大陆热是在87年12月，当时正值解除了不准民间人到中国本土探亲访友的禁令的时期。后来，一般老百姓的观光旅游业实行了自由化，游客有所增加。那些希望找到生意机会而去大陆的中小企业的“老板”使得大陆旅游热越发高涨。台湾的中小企业之多，正如人们所说的“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碰上社长。”据说，这些人多数以上已经去过中国。

现在台湾的外币保有值在世界上都可称数一数二。但好的景气和金钱过剩现象招致了向土地和股票投机，成本上涨。另外，再加上台币升值，住民要求保护环境等一系列内外压力，一些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是不向海外转移。这样，成本只需台湾十分之一的中国大陆就成了寻找新的出路的绝好机会。

财界巨头秘密访华

“给新的大陆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台湾产业界的巨头，台湾塑料集团董事长王永庆对中国的访问。七十五岁的王永庆靠自己艰苦奋斗而举世成名，被称为台湾的松下幸之。”

一位熟知日本情况的报社的朋友这么说。以调查投资环境为目的的王会长的大陆访问在极秘的情况下进行的。但90年1月底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中国时报》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以头条新闻公开了此秘密，给台湾全岛极大的冲击。

报道说王会长透露了，中国方面的领导人表示①在大陆办工厂所需投资总数的三分之一将愿意贷款，在税率方面也将采取优惠政策；②考虑到天安门事件后海外的反响，大陆方面本着反省之诚意，努力改善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意味深长的是，就王会长访中之行，著名月刊杂志《天下》在3月刊上专门发表了题为《询问千所大企业》的专题报道。

就“你对王永庆访问大陆怎么看？”一问，21.5%表示“很有价值”，69.2%表示“能够理解”，实际上，表示肯定的达90.7%，而表示否定的只有5.7%。

对“台湾塑料对大陆投资将对台湾的产业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一问，62.8%回答“海峡两岸结合其长处将对台湾产业带来新的发展。”但也有27.6%担心“台湾产业会出现空洞化。”对“政府是否应该允许向大陆直接投资？”一问，70.6%表示“应该允许”，远远超过了表示否定的9.5%。

“民间将牵着政府的鼻子，渡向台湾海峡两岸”——当时台湾媒体这样的报道很醒目突出，他们强烈要求对大陆政策有新的展开。

迂回战术才是贤明之道

但要改善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在政治上要克服的障碍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一两年来大陆方面一直警戒的台湾在搞的“弹性外交”。台湾方面本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扩大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实务关系，在外交方面也开始发挥其独特性。同时，还努力争取已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意欲满怀地要收回失地。曾一时只剩下二十二个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一下子又增加到了二十七個。

台湾的这些动向大陆方向认为是台湾想搞独立而展开的，对此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并表示，中国一方面希望和平统一，但另一方面不放弃“行使武力”的权利。

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在维护其存在和正统性，“弹性外交”并不是什么搞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的行为，并且反驳说，大陆方面一边对台湾采取怀柔政策，一边企图使台湾在国际上孤立化。

努力打开这种僵直状态的主要是那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经济界人士。

“老把政治打在前面，就会走进死胡同。扩大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是解决海峡两岸纠纷的贤明之道。”

在台北见到的一家电子公司的社长这么强调说。

要求继续实行“改革”的香港

与隔着海峡的台湾相比，土地连在一起的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关系就更直接得多。许多朋友对前一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都是感到“恐怖性的冲击”。另外对1997年香港主权要回归中国不少人是在不安中观望着。

“到六·四前一切本来都很顺利。但那个事件使得人心都散了。”

一位两年半没见到的老知识分子这样述怀道。

其中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天安门事件后对与中共中央公开唱“反调”的左派报纸香港《文汇报》李子踊社长的处理。党中央撤除了李社长的职务，从北京派了一位新社长来收拾局面。结果，同报社就分成了“继续留任”和“退出报社”两组。我见到了我一位在这报社工作的老朋友，他是顾虑最近的动向而“继

续留任”下来的，是一位骨干记者。他说，“我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抱着希望才留下来的。但那些退出报社的人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有机会，还希望与他们一起工作。”

牢牢抓紧政治思想工作的党中央的首都北京“改革开放”最前线的大陆南大门香港之间毕竟有不同之处。在香港即使是左派性的报纸对改革派和民主派的顾虑还是很深的。

另外，香港还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国际都市，要求安定繁荣的愿望极其强烈，这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

“性急地搞什么民主化或要求权利，只会是破坏安定繁荣，鸡飞蛋打，一无所得。香港的生存与中国大陆、特别是南部的深圳经济特区及广东省的动静是息息相关的。”

亚洲最大的儿童玩具制造业、开达实业公司的丁鹤寿会长这么说。他前不久一直担任香港工业总会会长，声望很高。

“仅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就有一两千多家公司、约二百万人的中国企业和工人在为香港企业组装各种产品或进行委托加工。这种牢固的依赖关系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也没丝毫松开过。这是显示香港与大陆相互依存的铁的证据。”

丁会长的话铿锵有力。光开达实业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就有两个工厂，在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四个工厂，有一万两千名大陆人在这些工厂干活。

我从香港到深圳经济特区，参观了蛇口地区的一个工厂。近两千名年轻的女工有的在组装各种儿童玩具，有的在专心检查成品。深圳大学有六名学生正好来这儿进行技术实习。

希望周围各国的协作

“这一年来最令人不安的是‘智力外流’的问题。前年约有四万人、去年有四万三千人，今年预测会达到五万五千人左右。”

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苏泽光专务理事很有把握地说。但他接着指出，①香港本来移民海外的就多。到1986年的10月间，每年平均有两万人移住到加拿大、美国及澳大利亚；②一旦移住到海外的香港人每年有一万人前后又回到香港继续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最重要的是香港本身要成为有魅力的地方才行。为此，目前正在计划在香港岛西侧的大屿山建设拥有两条飞机跑道的国际新机场来代替过密的启德国际机场。另外，还要扩充港湾设施，修建道路和桥梁。”

香港政厅的宣传担当官员一边向我展示模型一边这么说。

“这项大型工程总额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工期要十五年前后，1997年以后还要接下去。”

实现这样的计划，香港人强烈希望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能继续下去，日本、美国等先进各国能予以投资和协作。

现在一般的说话是在香港在住的日本人有一万三千，日本企业在一千家前后。但一家对实况调查熟知的人才派遣公司说，日本有近三万人，日本企业有一千六百家。

我在香港逗留期间，正赶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持召开的欢迎深圳经济特区代表区的招待会。到会的除了日本及欧美各国以外，还有来自韩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国的企业代表及政府有关人员。香港贸易、金融、情报、房地产各界的代表也参加到会。

这一连的动向使我感到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两岸三地”尽管有矛盾和对立，但都呼吁外部世界的协作，并在探求一条确实的“共存之道”。